

环境困境与文化审思

——文化生态视域下藏族生态民俗文化溯析

韦仁忠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西宁 810001)

摘要: 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目光局限于物质形态,而忽略了历史文化、人文精神内容,从而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通过梳理藏族生态民俗和生活禁忌文化,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文明转型和价值重铸的大背景中加以论述。藏族丰富的生态民俗文化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提供了一套可供参照和借鉴的价值体系,吁请人们走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

关键词: 环境困境; 文化审思; 藏族生态民俗

中图分类号: K892;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3)04-0144-05

人类利用技术手段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伴随着这些成果灾难也随之降临,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下,对物质文明与技术文明的极度尊崇,使人们的眼光局限于物质形态,而忽略了历史文化、人文精神内容,从而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1]7-22}。现代化改变了人的生存环境,也带来文化生态系统的复杂化^{[2]6}。“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扫荡了人类自古以来对自然的敬畏心理,伴随着私欲的无限膨胀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肆意掠夺破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资源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作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同样受到生态不断恶化的威胁,由于气候和各种人为因素,冰川后退,雪线上升,湖泊萎缩,河水断流,“中华水塔”供水和气候调节功能的退化日益影响到中国乃至东南亚的生态安全。为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2004年开始,国家对青海省三江源(黄河、长江、澜沧江)的牧民开始了迁移,出现了规模仅次于三峡移民的“生态移民”。

本文试图从生态民俗的角度溯析、总结藏族传统民俗与禁忌文化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作用,吁请人们回归理性,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重树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及利用的伦理观与价值观,为建设人类美好家园、“诗意地栖居”提供一些启迪和参考。

一、生态学的诞生及人文转向

生态学(ecology)一词于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

家海克尔(H.Haeckel)在《有机体的普通形态学》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并为生态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互相关系的学科。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生态学走向成熟,并开始从传统生态学向现代生态学过渡^{[3]109}。

20世纪末,生态学和人类学在解决人类面对的生态难题时从不同的道路走到了一起。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J.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理论》的出版,标志着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之后,人们把目光转向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以此作为生态学的主体,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关系,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晌及环境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等。此时,生态学以参与解决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为己任,其研究重点逐步从以生物界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社会为主体,从主要考察自然生态系统过渡到主要考察人类生态系统。

20世纪70年代,生态问题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反思。《寂静的春天》是美国女作家雷切儿·卡逊的代表作,她在书中以女性特有的生动笔触,详尽细致地讲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我们的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卡逊还尖锐地指出,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对于自然的傲慢和无知,因此,她呼吁人们要重新端正对自然的态度,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收稿日期:2012-9-19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的文化调适研究”(2012-GM-030)

作者简介:韦仁忠(1976—),男,哲学社会学部副教授,博士,E-mail:weiren369@sina.com

(一)文化生态解读

文化是一个大的系统,同时又是一个生态系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因此,文化系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整体。文化生态是“指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方式和状态”^[459-61]。它也是一个大的系统,即文化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互相联系,是三大系统中各种因子的关系所构成的整体。民族文化生态就是指民族文化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共同形成的结构系统,以及与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关系”^[531-33]。

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全面、稳进、长久的态势。也是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得到保护的态势,更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态势。文化是生态系统的“文化”,人类的文化一旦失去正确的导向,文化生态将会失去平衡,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将是一场灾难。

(二)生态视野下的民俗文化

生态民俗系自然的生态学与人文的民俗学交叉所产生的学术新概念,是对“联系食物链的有关民俗文化”的统称^[676]。生态民俗学在生态观的视野中,审视和探究民俗文化,关注生态环境对人类民俗文化的反作用,最终在人类与自然的联系中寻求一条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之路^[742-46]。其宗旨是:在当今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背景下,恰当整合生态系统与民俗系统,重新调整人们的生活与价值观念,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俗模式,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藏族生态民俗与生活禁忌解读

民俗文化是一种存活于大众生活中的通俗文化,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民众而言,它以自己的种种形式向人们奉上一个可供心灵“幸福栖息”的“精神家园”。它促进价值认同、精神凝聚和品格塑造的功能,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支撑,对文化生态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117-22]。

(一)藏族民间文化习俗中的生态文化理念

不同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造就了当地人不同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及历史文化。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有的宗教文化造就了藏族极具生态意识的传统风俗习惯。这些习俗富有“绿色”气息^[817-21]。

1.敬畏、亲和自然的习俗

在藏族人眼里,大自然是不可轻易改变和破坏的,人类要生存必须充分尊重和适应大自然,否则,人类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会面临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他们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动物、植物等生命有机体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山体、天体、水体等都是具有生命意志和性格精神的。藏族见到风口、河口、高山要拜,显示对山、对水的敬畏和亲和。他们对山和水高度崇拜,视山为“神山”,视水为“圣水”。他们认为“神山”是不可以破坏的,必须得到有力保护,并用生活中一些例子、神话、传说赋予“神山”的不可侵犯。对山如此,对水亦如此。他们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护,他们视湖泊为“圣湖”,当地百姓像“转山”(转山是盛行于藏区的一种庄严而又神圣的宗教活动仪式,步行甚至一路磕头,人们围着神山转一圈或多圈)一样要在重大节日期间“转湖”,以体现自己对湖的崇拜。

2.与众不同的“贱人”观

在藏族地区凡是直接或间接破坏草地、屠杀生灵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卑鄙的。在这种观念之下,人们普遍歧视猎人、铁匠、木匠、捕鱼者等。认为这些人制造了挖掘工具间接破坏了原始的自然植被,使之千疮百孔。视铁匠是一种破坏分子,也是不洁之人。猎人、捕鱼者们屡次犯禁,采集、捕杀生物,被认为是脱离佛法教规的人,无视生命的珍贵与平等,人们一般对其持鄙视态度。觉得他们卑贱、低下,不愿与他们来往,成为被社会孤立的贱民。相反,在藏族的观念里,乞丐、流浪汉、小偷不被认为是贱人,这就是藏族独特的环境保护价值观。即凡破坏生态环境,毁灭其他生物的人是道德低下的“贱人”。现在藏族的这种“贱人”观已有所改变。

3.清贫中的富饶:重精神文化追求

藏族轻现实物质需求,重精神寄托。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藏族对现实中的物质需求欲望很低。生活节俭,衣、食、住、行都相当简单,藏族古语曰:“男人节制是智人,女人节制是贤人,大官节制是伟人”。在牧区,藏族的生活非常俭朴,一壶清茶、一碗青稞炒面就是一顿饭。一件羊皮袄,白日当衣穿,夜里作被盖。一顶帐篷就是一个温暖的家。他们从大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没有刻意追求,对获取财富持一种淡漠态度,一切活动都顺其自然、量力而行。能维持生计,就会随遇而安。但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却非常执着,远远大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在常人眼里非常珍贵的金银,他们不是据为己有,而主要用于塑佛像、镀寺院屋顶等,有时也作祭品,以祈祷万物生长,消除自然灾害。

藏族对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利用时常表现为一种崇尚自然的行径,因此少了许多谋利的色彩。对经济生活的节制,却激发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的大半时间与精力都投入精神追求之中,清贫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构成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两个方面。在高原艰苦的环境里,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对人生快乐和幸福的理解、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4. 藏族部落习惯法中对环境的保护意识

“风尚、习俗和舆论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9]117},说明习俗在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分量。藏族传统习俗中的生态法则、部落法规中的一部分规定对藏族生态伦理的建设起到了一种制度保障的作用^{[10]123-124}。它的权威性迫使人们自觉遵守约束,最终使之上升为伦理习惯和伦理行为,这在客观上对本部落所属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这些习惯法规中以保护环境为宗旨,明确规定了对违反者的具体惩罚办法。如违反草山管理的处罚规定:“引起草山失火者,罚其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失火烧着草场属大案件,罚款很重,按一马步罚1.5块银元。”又封山禁令规定:“禁止狩猎,如发现随便狩猎者,没收猎物、枪支,然后鞭打或罚款。”^{[11]108}类似的法规还有很多,如“草原轮牧及迁居法”、“森林苗木保护法”、“狩猎采集禁许法”、“兴修水利和用水规矩”、“资源开采与商品外运限制”等。

5. 传统生产方式中的环保观念

藏族以牧业生产为主体,伴有小部分的农业或半牧半农生产。游牧中藏族“逐水草而居”,其“逐”字真是循自然四季规律所为。严格按季节、分地域进行放牧,使草地得到轮休生养。藏族的农耕经济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靠天吃饭”,与自然共生共存,所有农田依照生态环境呈现立体布局,开垦的农田与天然草地相间分离。以使用农家肥为常态,实施耕三(年)休一或耕二休一制,由于多数藏区属于深山地带,所以很少有灌溉的习俗,尽量以“不动土”为准则。这一切文化特征体现了藏族的环保意识 and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从藏族生态文化的功能上看,其传统的生态民俗对青藏高原地区生态保护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审视,藏族生态文化的积极意义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化浪

潮的冲击下,藏族生态文化发挥作用的范围越来越有限。

(二) 人神关系下的藏族生活禁忌

古人云:“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自然禁忌行为是藏族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在藏族人眼里,凡神圣的地方就是禁忌之地。自古至今,藏族的自然禁忌涉及面很广,形成一个系统的禁忌网。生活禁忌的“不可为”在意识形态中转变为一种伦理需求,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禁忌观念构成了藏族保护生态的最直接要件^{[12]106-109}。

1. 对神圣物的禁忌。藏族出于对神的尊崇而产生了诸多自然的崇敬性禁忌。在牧区藏族都禁忌“动土”,在神山上挖掘那是禁忌中的大忌。认为神山是祖先之神,或全藏人全部落的保护神。坚决反对在神山上采集砍伐花草树木,森林和花草被看作是山之毛发,砍伐采集就是对山神的冒犯与不敬。不允许在神山上打猎、喧闹,因为那是对神山的一种不恭;禁忌将神山上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圣水也有一套禁忌法则,严禁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不准在湖(泉)边堆脏物;如果在湖(泉)水中大小便,那将是很严重的一件事,认为阴部将会溃烂。秃鹫被看作众鸟之王,因为天葬的尸体靠它来处理,视其为神鹰,绝不允许捕杀它。视土地为圣土,被认为是山的肌肤,草原严守“不动土”的原则,禁止在草地胡乱挖掘。即便是在农业区也不能随意挖掘土地,每年开耕前要先祭土地,去地里劳动穿新衣,不能在田野赤身裸体,表示对土地的尊敬。对神圣自然的禁忌与保护,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得到执行,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一种传统民俗。

2. “不杀生”的禁忌。藏区,人们一般不妄动任何生灵,包括鸟兽虫蝇,行路遇见爬行虫便绕开它;飞虫飞到身上或家里不打死;反对以药灭鼠、以器捕杀狐狸。严禁侵犯“神牛”与“神羊”(专门放生的),神牛神羊只能任其自然死亡。禁忌在宗教节日(正月十五、五月十五、六月六日、九月二十日等)宰杀牛羊;同时每月十五、三十日也是禁止宰杀的日子^{[13]73}。

3. 对鸟类禽类的禁忌。禁忌捕捉任何飞禽;禁忌惊吓任何飞禽;禁忌拆毁鸟窝、驱赶飞鸟;禁忌食用鸟肉(包括野外的和家养的);禁忌食用禽蛋^{[14]73-84}。

4. 禁忌打猎。大多藏区是禁止打猎的,尤其禁止猎捕神兽(兔、虎、熊、野牦牛等)、鸟类及狗。禁止狩猎藏羚羊、野马和野驴等珍稀动物;禁止猎杀尤其是罕见的奇异动物,认为那是某个山神的家畜,或是某个山神灵魂的寄托,绝不可猎杀。

5.对家畜的禁忌。禁忌牲畜生病时外人来串门做客;禁忌食用一切爪类动物肉,包括狗猫等,禁忌食用圆蹄类动物驴马骡等。藏族对各类家畜尤其对马和狗倍加爱护,视它们为最忠实的伙伴,禁止对马和狗无礼或鞭斥^{[13]175-176}。

6.其他禁忌。禁忌捕捞水中任何动物;禁忌食用鱼蛙等水中动物;禁忌故意踩死、打死虫类,除此以外,藏族还有对火及灶的禁忌,以及人事方面的禁忌等^{[13]175-176}。

藏族人严肃地恪守着一系列约定俗成的禁忌惯例,体现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生态意识,表达了他们遵循自然法则、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思想。这一思想经由传统的积淀而形成人们自觉的意识和行为,以一种固定的风尚和习俗的形式传承下来,对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起了良好的作用。从而在根本上保护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生存权。

藏族人的自然崇敬观念、自然禁忌机制、价值取向和习惯法令共同构成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网络,它作为系统的整体在发挥着作用。藏区所有的禁忌与法规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崇敬之上,没有崇敬信仰,法规不可能被执行。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决定了藏族的一切生产方式不是纯粹为了谋利,因此,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无限制的消费等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审思： 理性的回归与“诗意地栖居”

(一)回归自然：“热爱自然本性设计”

“热爱自然本性设计”即“珍视自然的倾向”，最早是由美国环境学家斯蒂芬·R·凯勒特（Stephen R Kellert）提出来的。“热爱自然本性设计”的思想在藏族生态民俗文化里有重要体现，他们以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渗透着“万物有灵、畏之敬之”、“天赐之物，取用有方”、“一草一木，皆益于我”等珍视自然的价值观。

藏族生态民俗的主导思想崇敬自然、尊重生命，构建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其中隐含着超工业化、现代化的胚芽，涵盖了藏族千百年来的生存经验和智慧。虽然它与现代化的模式有着某种距离，但在许多方面却与后现代的思考 and 理论有着可呼应的地方。本文梳理藏族生态民俗与生活禁忌文化，意在倡导“热爱自然本性设计”的思想，吁请人们重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应注重多元化的民族民俗文化元

素，理性借鉴和吸收藏族“自然为母，睦邻善待”的生态民俗观，克服人是自然的征服者的意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文明转型和价值重铸的大背景中来加以思考，走出或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密不可分整体。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对自然的态和行为，从而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前行的基础和后劲。

(二)回归理性：“深生态学”的环境价值理念

“深生态学”是相对此前的“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而诞生的，它是由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aess）创立的现代环境伦理学新理论，是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具有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15]10}。此理论认为人类遭遇空前的生态危机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文化的危机，原因在于我们自身的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失调。这是人类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理性思维的一次深度回归。

人类经历了一段快速的现代化之后，蓦然发现“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16]28}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亡羊补牢式地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价值评估。现代化带给人类社会的并不全是福祉，人类的生存环境也为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大自然开始频频向人类发出警告，在世界各地，各种生态性灾难接踵而至，于是，整个人类社会终于醒悟过来，开始了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重新考量^{[17]16}。在对人类的活动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的反思中，现代民众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传统、思维观念实际上都与地球环境有着多维度的密切关联，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取决于整个人类的生态观和价值观^{[17]16}。

(三)觉醒与展望：为人类“诗意地栖居”

回归自然，为人类“诗意地栖居”，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援引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进而提出“诗意地栖居”这一哲学命题^{[18]96}。是海德格尔对人性异化后渴盼回归的至高情怀，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一种至高境界的向往。

追溯历史，从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珍爱土地，到法国学者阿尔伯特·施韦泽的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再到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理想，其价值导向都和本文中溯

析的藏族生态民俗文化的精髓是一脉相承的,但愿这些智慧能成为人类觉醒后反思自己行为的理论渊源和行动指南,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热切呼唤与向往。最后我想用美国生态学家艾伦·杜宁对“诗意”的独到解读和畅想作为文章的结语:“接

受和过着充裕的生活而不是过度的消费,回归于对技艺、创造力和创造的尊崇;回归于一种悠闲的足以让我们观看日出日落和在水边漫步的日常节奏;回归于值得在其中度过一生的社会;还有,回归于孕育着几代人记忆的场所”^{[17]42-46}。

参考文献:

- [1] 付雪莲. 民俗文化 with 城市文化生态的构建[J]. 中华文化论坛, 2011(6): 17-22.
- [2] 杨小波, 吴庆书. 城市生态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76.
- [3] 戢斗勇. 文化生态学: 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109.
- [4] 孙卫卫. 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视野[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4(1): 59-61.
- [5] 包泉万. 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势在必行[J]. 理论与创作, 2001(1): 31-33.
- [6]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新版)[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6: 76.
- [7] 喻海. 生态民俗之黔东南少数民族人居环境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42-46.
- [8] 贾秀兰. 藏族生态伦理道德思想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4): 17-21.
- [9]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17.
- [10] 刘强. 藏族生态习惯法对环境的积极影响[J]. 法学研究, 2011(2): 123-124.
- [11] 张济民. 青海藏族部落习惯法研究[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108.
- [12] 苏永生. 青藏高原地区生态保护立法模式的确立——以藏族生态文化为视角[J]. 河池学院学报, 2008(4): 106-109.
- [13] 南文渊. 藏族生态伦理[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173.
- [14] 汪玺师, 尚礼, 张德罡. 藏族的草原游牧文化——藏族的生态文明、文化教育和历史上的法律[J]. 草原与草坪, 2011(5): 73-84.
- [15] 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10.
- [16] 狄更斯. 双城记[M]. 石永礼, 赵文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8.
- [17] 江帆. 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6.
- [18] 马丁·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栖居[M]. 都元宝,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96.

Environmental Predicament and Cultural Reflections

—Tibetan Ecological Folk Culture Analysis from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

WEI Renzhong

(Party School of Qingha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Xining 81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human beings are engaged in the one-sided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obsessed with material gains while ingoring historical culture and humanistic spirit, which results in the imbalance of cultural ecology.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s the Tibetan ecological folklore and culture, and investigates in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in context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revaluations. Tibetan's rich heritage of ecological folk culture provides a set of available value system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is paper appeals to the people to transcend out the narrow confines of anthropocentrism, re-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reflect on human being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 nature.

Key word: environmental predicament; cultural reviews and reflections; Tibetan ecological folk culture

[责任编辑: 箫姚]